



张柠主编 文化先锋书系——刀锋文丛

刀锋文丛

# 批评的 田野

陈晓明 著

PIPINGDEKUANGYE PIPINGDEKUANGYE

张 柠 主编  
文化先锋书系——刀锋文丛

# 批评的旷野



批评的旷野

陈晓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旷野/陈晓明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8  
(刀锋文丛/张柠主编)  
ISBN 7-5360-4734-7

I. 批… II. 陈… III.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840 号

责任编辑: 邹晴华

封面设计: 朱 竞

技术编辑: 薛伟民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 2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734-7/1 • 3745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 目 录

## 第一辑 理论的张力

- 3 眺望 21 世纪文学
- 8 后现代在中国的曲折道路
- 19 德里达：解构主义大师
- 30 卡尔维诺：纯文学最后的救命稻草
- 35 政治上正确与后殖民理论
- 52 批评旷野里的精神之树
- 65 走进历史深处
- 75 历史批判的责任
- 83 在文学创新中被悬置的文化身份
- 93 他山之石更奇崛
- 104 批评的分化与冲突
- 114 大众文化：新的压迫与解放
- 130 文本批评的黄金时代
- 146 多极化与文学的力量
- 150 文学：一种奇怪建制？
- 159 当下的规训或美学的托辞？

## 第二辑 反诘后现代

- 179 文学的道德诉求质疑
- 192 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反拨
- 198 摄影文学的先锋性



- 205 21世纪：如何想象中国  
213 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  
220 诺贝尔文学奖青睐异国风情？  
225 小说的魔法或给历史施魔  
231 小叙事中驾驭大历史  
236 对人性的绝对叩问  
241 迷醉于前现代的后现代  
246 执着不变的李锐  
250 在偏斜中发掘荒诞的诗性  
256 生活的绝对侧面  
259 李师江：上半身写作？  
263 向命运和性格的极限推进  
268 别样年华，另类世界  
272 沉默中的刻骨真实  
276 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流向

### 第三辑 做文字的情人

- 289 “时尚前卫”与亚文化乌托邦  
298 在爱欲的尽头  
304 身体的献祭与命运之诗  
307 池莉：似水还是火  
311 给历史和我们还魂  
315 奇妙的邪性  
319 对精神下降年代的质问  
325 自在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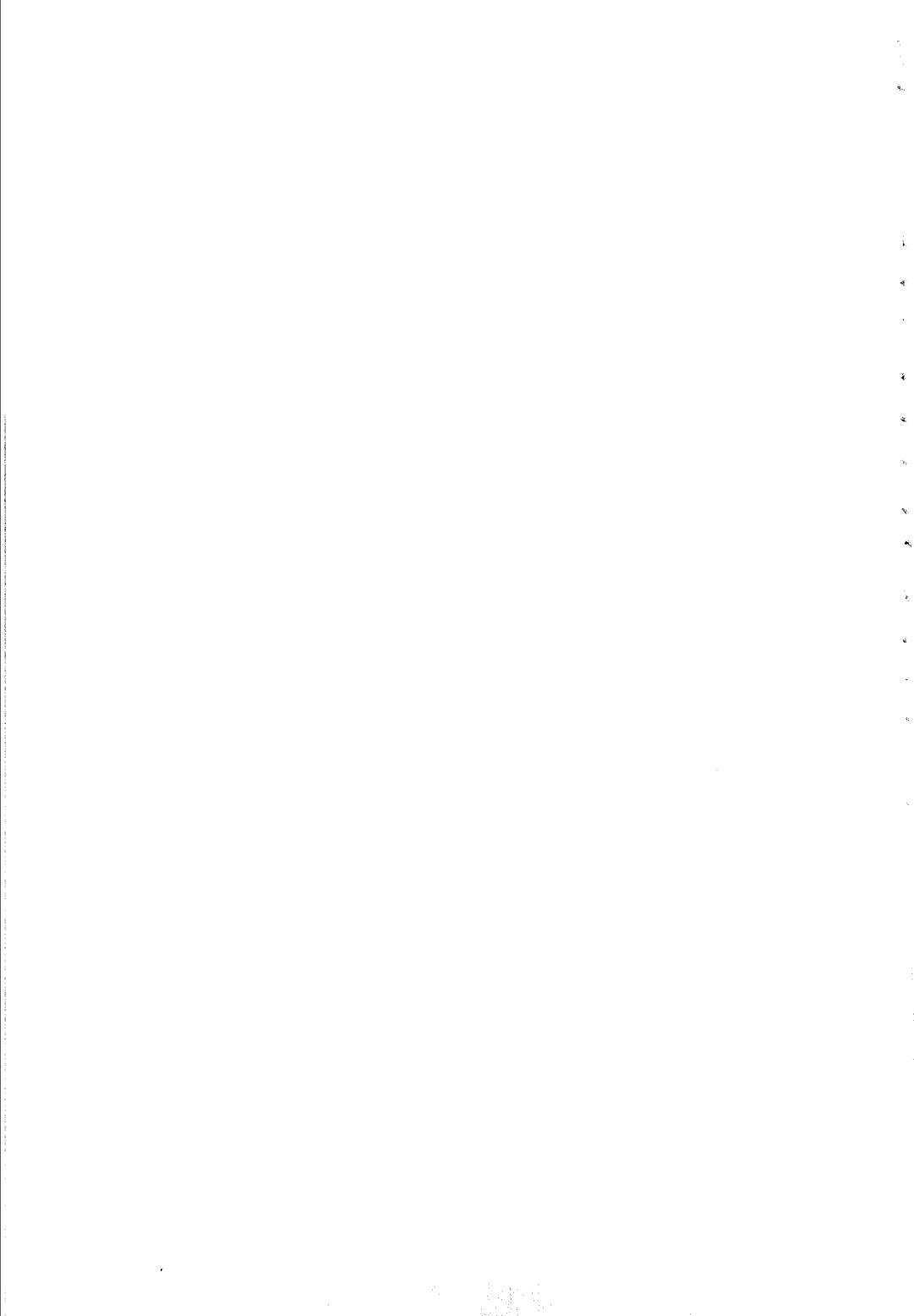
- 329 爱的异化或超载
- 334 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
- 341 昔日“美女”今犹在
- 348 守望私人生活
- 354 做文字的情人
- 360 绝望中透示诗情
- 367 写作的命运：大历史，小叙事
- 373 在诗的面前，幸福毋庸置疑

第一辑

理论的张力

批评的  
向

田野



## 眺望 21 世纪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现代性规划的一个有机部分，与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是它的冲动、梦想、苦难和呼喊。文学是民族自我认同的精神形式，特别是当这一民族面对强大的世界历史的挑战时，文学表现了民族内心的激动和超越性的想象。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总是以外在化的世界历史为参照系，事实上，它就在世界历史内部，它是这一历史过程最为紧张而深刻的内在分裂。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怀抱着巨大的创造历史的热情，它也确实书写了雄浑激越的史诗；但它也隐含了太多的悲剧情愫，太多的矛盾和苦难。

在告别 20 世纪之际，我们对 20 世纪文学既怀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也怀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眺望未来，当然既兴奋也迷茫。试图勾画未来显然是不自量力的轻慢之举，未卜先知之类的预言能给我们带来信心吗？我感到犹疑。

不过，今天我们处在新世纪的临界线上，还是可以看到未来的朦胧的轮廓。不管如何，21 世纪的开始与 20 世纪截然不同，

想一想 1900 年人类承受的那些灾难，中国经历的变故。2000 年即将过去，世界历史似乎泰然自若，中国也平静如常。世界历史确实结束了它的动荡不安，它的冲动和激烈。留给文学的，当然也是一种平静、自在和寻常。也许我们不得不借用福山的说法：历史已经终结。这并不是说世界就没有矛盾冲突，而只是说，那些大的历史分歧，大的观念冲突，大起大落的选择和悲剧都不再是其根本的不可逾越的内在困扰。

留给中国文学还能有什么呢？只有文学自身面对自身。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历史冲突和政治诉求的附属品，文学就是文学，它是一种语言的构成物，它以它的艺术趣味及水准构成这一时期的精神现象。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寓言，也不是集体行为，它更多的是个人的经验或内心生活的表现。

21 世纪文学不再诉诸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之类的宏大情感，它是个人化的，局部的，对生活和现实片面性的表达。这种片面性才会给平静如水的小康生活或中产阶级趣味提供陌生化的“他者”空间。

21 世纪文学不再环绕沉重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它是轻松自如的，随意的，它与每个人都有一种新近感。它是一种自由敞开的文本。

21 世纪文学不再有武断的价值立场，它是多元价值的混合体。在表达的确实性方面，在观点和立场明晰方面，它确实差强人意；它的游戏精神，嘲弄与反讽的修辞性策略，使它缺乏坚实力，缺乏锐利和挑战，但它更适合普通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21 世纪文学缺乏深度性，它是语言的个性化的表达。文学写作只是因为对语言的迷恋，对阅读的偏爱它有理由进行下去。在

21世纪初期，也许悲天悯人的思想和情感依然有所作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语言的表现力。这就是所谓纯文学的存在依据。而大多数的畅销货色则更无须高深莫测的思想和沉重的精神负担。

21世纪的文学主要是畅销书。由于出版业不得不放开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文学这种东西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文学事业不再是意识形态生产的超级机器，它只是一种精神消费品，这就决定了出版商要以销售量来作为图书出版的根本动力。通俗读物与报纸的水准等量齐观，文学界的水平已经完全由报纸和影视媒体决定，这就是媒体霸权时代文学的基本命运。当然，文学作为语言的个性化构成物，它必然与影视媒体和新闻报纸有所不同，但那只是少部分偏执于文学艺术水准的人在做的负隅顽抗，也许物以稀为贵，实验文学会与通俗读物构成一种张力，使文学得以花样翻新以便勉强延续。

诗歌可能是维系传统文学生存的救命稻草。无论如何诗歌也不可能大规模市场化，不管是民间的俚语写作，还是知识分子的深沉思想，诗歌终归是语言的智力运作。人民性、民族－国家的后寓言叙事，或是后政治诗学……，都不过是21世纪初期历史过渡的观念桥梁。明白晓畅和深奥晦涩，都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修辞策略就是诗歌的本质，就是诗歌的最高信仰。

21世纪的文学会经受网络的全面扫荡。这不仅会改变文学的传播方式，同时会改变文学的叙事方式。网络文学势必打破传统文学的那种完整的艺术／修辞表达策略，那种随意性，偶发性，片断式，感想式，自言自语式……等等，使文学写作变成一种简单的陈述性行为，变成语言的平面线性操作。现代以来的文学写作所做的所有努力，在互联网时代，一夜之间化为泡影。网络时



代的文学写作真正是集体书写的狂欢节，一种后革命时代的游行、示威和口号。网络写作迎来了文化后革命时代，对于少数执着于经典文学观念和传统审美趣味的人来说，那确实是灾难年代的开始；而对于大多数青年表达者来说，这是写作新纪元的叫春季节。

21世纪的文学概念可能面临窘境，文学可能很难成立，只有写作。确实，文学这门艺术的存在，这门学科在大学教育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现代性的产物。尽管中国上古、中古时代就有文学，但这并未构成国家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现代社会才不惜调动一切资源来为国家事物，为现代性规划服务。21世纪的政治家被称之为管理层，而文学被称之为写作，它是个人表达的一种方式。

21世纪的文学是非体制化的文学，大量的自由撰稿人实际已经取代了体制内作家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他们代表了青年文化，既是时尚的，又是反主流社会的。这两者构成一种奇怪的对立。由于自由撰稿人可能有稳定的工作，也可能随处漂荡，文学群体已经从社会的强势阶层，转变成弱势群体，这严重影响了文学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年轻的写作者会自觉定义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它们对强势群体和主流文化构成敌视关系，批判性以及怨恨情绪，是其基本主调，因此，歌功颂德之类的宏大文体将如同恐龙一样灭绝。

21世纪上半期——这是可以预见的，文学逐渐演变成一项女性的事业。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容易自以为是而选择主流社会，跻身社会强势阶层，为增加个人财富和国民GDP而努力；女性则更多地选择文化艺术，或者像文学这种处于弱势的文化。就目前的大学中文系女生超过70%的比例来看，这个趋势会愈演愈烈。

这当然也会改变文学的审美趣味。文学无疑会更加纤细、娇柔，当然很舒服令人愉快。它与时尚审美趣味的女性化如出一辙。也许最后人们发现，21世纪的精神生活由女性支配。男人支配女性身体，但女性引领男人的精神生活。只要看看当今国际舞台上所有的政治强权人物不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人，而是热衷于做秀的女性化人物就可见未来趋势。

总之，21世纪是一个平静、让人放心的世纪，全球化毕竟伴随着理性和民主，文学不再是民族－国家战斗的资源，它毋宁说是个人度过余暇的一种手段。



## 后现代在中国的曲折道路

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历经十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始终暧昧不清。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但多少还有些堂皇悲壮。因为现代主义搭上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快车，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变革前驱而被渲染的。现代派文学及其思想理论一直就是改革开放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样板和标本，它所经历的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磨炼，表明它对新旧思想体系都构成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很有限，转化为文学创作成果的就更少见。所谓“85新潮”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但现代主义确实构成了一种观念的冲击，它虽然没有有效地建构新的体系，但它瓦解了旧有的秩序。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现代主义当然也显得不伦不类，在80年代后期，文坛就一度时兴过“伪现代派”的说法，那种揶揄的语调，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的急切渴望相比，真有一种老谋深算的意味。确实，现代主义并未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扎下根，因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知识积累，在当代中国并未打下基础。现代主义的那种反叛性和超

越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状都大相径庭。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主义开创的暧昧场景中登台，它本身显得更加暧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最初时期，它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的身份。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台相比，它既无天时（需要新思想的历史机遇），又无地利（改革开放形成的文化态势），更无人和（文学界创新的共同愿望）。然而，后现代主义夹着尾巴躲在“现代派”的麾下步入历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比现代主义晚多少，大陆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词汇的可能是董鼎山在《读书》1980年第12期上发表题为《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这篇评介性质的短文，是否就是汉语中的“后现代”一词的创造，还难以断言。在台湾，早至70年代末期就有“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说法。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词汇是否受到台港的影响，尚不确定，但已经有其在先，大陆就很难争夺这一发明权。在80年代初期介绍现代派的文丛和文章中，就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只不过那时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派。如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其中有不少篇幅选用后期现代主义作品。在该书中，袁可嘉把荒诞派戏剧和法国新小说等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主义”。但袁可嘉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就发表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当年第11期），可见袁可嘉的这套文丛付梓较早，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陈焜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1年）也多处论述到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现代派艺术特征。他没有使用“后期现代派”的说法。在伍蠡甫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中，也选有法国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阐述文学观念的文章。很显然，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黑色幽默，都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但该选本没有



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

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少量的用“后现代主义”来评介西方文学的新近成果。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得克·杰姆逊。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听者云集。这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教仪式，传教士本人并不信教。杰姆逊一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但奇怪的是，杰姆逊本人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成长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唐小兵翻译的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使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迅速波及中国各地。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赖于后结构主义打下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虽然与后结构主义经常通用，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主要限定在哲学与文学理论方面，而前者则更偏向于文学艺术创作、大众文化、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后现代”所指范围要广得多，以至于它经常被视为是包含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更大的具有广义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要早一些。80年代初期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就有译介后结构主义的文章。徐崇温在1986年出版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普及读物，在当时的影响不可小视。但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广泛，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也没有令人们耳目一新或惊恐不已。但后现代主义不同，不管人们的直接反应如何，它在人们心理造成的刺激是非常强烈的。也许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涉及的面更广，它不再只是哲学领域或学术圈子里的事，它与更广泛的文学艺术实践，与理论话语的表达方式，甚至与人

们的行为方式、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念相联系。也许有一个现象有些奇怪，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最初传播的时期，它们各自为阵。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大惊小怪与对后结构主义的熟视无睹并行不悖。似乎只有解构主义才与后现代主义沾亲带故。

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其传播面其实并不广泛，只限于少数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80年代后期，在众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中，王宁是最早不遗余力地推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大凡涉及到西方的理论思潮，免不了首先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介绍，但王宁似乎怀着更大肯定性热情加以阐发。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在批判与怀疑的语境中勉强长大的。最早进行后现代主义引介和阐释的研究者其实寥寥无几，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一部分翻译的著作理论文章论著才陆续问世。1991年，王宁等翻译出版了由荷兰人佛克马编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这部书立即受到欢迎。1992年，王岳川与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出版，也引起相当的反响。1993年，刘象愚等翻译出版哈桑的《后现代的转折》一书。紧接着一系列的国内学者的著作陆续出版。它们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1994年），王宁著《多元并生的时代》（1994年）、赵祖模主编《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四卷，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伦佑主编的国内数位后学研究者编辑的以及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5卷，1995年）等等。这些著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较大反